

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

梁 云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拓跋鲜卑是鲜卑的重要一部,因建立北魏王朝,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早期拓跋鲜卑历史中,史学界对嘎仙洞石室祝文及发祥地、拓跋鲜卑族名来源、族源、早期迁徙、早期社会等内容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考古学研究成果为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了支撑。

关键词: 鲜卑; 早期拓跋; 研究; 回顾

分类号: K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12)01-0068-07

鲜卑是秦汉(或更早)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古族,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属东胡部落集团。汉初,匈奴冒顿单于破东胡,鲜卑“远窜辽东塞外”,退居鲜卑山,因南隔乌桓,“未常通中国焉”^{[1] 卷90 2985)},故《史记》、《汉书》均未提及。鲜卑作为部族之称,始见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隋唐以后,基本上从汉文史籍中消失。按照最早驻牧的地区,史学界基本趋向于鲜卑族有两大分支:一支是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亦称北部鲜卑);一支是驻牧于大兴安岭南段“鲜卑山”因山名族者,文献中称鲜卑(亦称东部鲜卑),其后出现的各支鲜卑势力多为他们的分支^[2]。

拓跋鲜卑,完整地说“应当包括北魏建国以前的拓跋部、建国之后的拓跋魏,还有建立南凉的秃发部,一称河西鲜卑等等”^{[3] 卷237)}。早期拓跋鲜卑,学界一般将它定位于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建立北魏之前,拓跋部的起源、迁徙、发展壮大的历史,具体包括拓跋鲜卑“大鲜卑山”时期、“大泽”时期、“匈奴故地”时期(含“长川”时期、“盛乐”时期)的历史。

拓跋鲜卑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崇山密林中缘起、生息、繁衍,在呼伦贝尔草原成长,在蒙古高原的河套阴山地区进一步壮大;迁徙中,与匈奴、

高车等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以及汉民族交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步步发生着深刻变化,出现了向着封建社会演变的各种因素;室韦人、契丹人与拓跋鲜卑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拓跋)鲜卑人、后来的契丹人、室韦—达怛人……语言相同或相近,地域相连,风俗习惯也相似……应该当做一系列有历史继承关系的对象来把握”^{[4] 卷556)};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拓跋鲜卑作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第一个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以显赫声名载入史册的民族,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并引起关注。一定时期内,中亚人概名中国为拓跋^{[5] 卷39-41)},“在突厥语世界中,‘拓跋’一词成了汉地的通称,远传波斯、阿剌伯和拜赞廷”^{[4] 卷559)}。因此,早期拓跋鲜卑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为系统地了解鲜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同时,对中华民族逐步形成的历史与中国疆域形成史,对中国古代史、北方民族史、呼伦贝尔地方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意义。

拓跋作为鲜卑部族之一,史学界或对其进行专题研究,或并入到鲜卑史内容中加以论述。不同时代的中外史学工作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利用不同的方法,对鲜卑、拓跋鲜卑历史进行探索研究,取得了丰厚成果。

收稿日期: 2011-06-14

作者简介: 梁 云,女,山东蓬莱县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副教授。

一、国外研究状况

鲜卑学形成之初就是一门世界性学科。20世纪初,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中国,随军来华的(法)伯希和在敦煌抢到一大批新史料,回国后他开始以西方人的世界观来研究中国史。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一文,论证了在7世纪突厥碑文中和东罗马、伊斯兰教徒的撰述中出现的Tabghac,即是元朝时丘处机西行之时曾在伊犁听见过的“桃花石”,中国史籍译写其音曰“拓跋”,是历史上西方陆续称中国为支那(Cina)、拓跋(Tabghac)、契丹(Kitai或Khitai)的几个代称之一^[5]。在20世纪30年代再版的《鞑靼千年史》^[6]中,(英)巴克尔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概括地阐述了鲜卑历史。同期,(日)赤崛英三和江上波夫两次对达茂旗百灵庙砂凹地六座鲜卑墓葬的发掘,是最早对鲜卑墓葬所作的考古工作^[7];(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遍考东胡诸族之部别、地名、姓氏、语言,对鲜卑诸氏(慕容氏、宇文氏、吐谷浑氏、乞伏氏、秃发氏、拓跋氏)进行了系统研究。^[8]《东胡民族考》是鲜卑学成为世界性学科的标志。

国外学者的鲜卑史研究相关论文有多篇。有关早期鲜卑史研究主要包括:(日)内田吟风《乌桓、鲜卑的习俗》^[9];(日)船木胜马《关于匈奴、乌桓、鲜卑的“大人”》^[10];(俄)耶·姆·札尔金特《中国编年史中的古代各族(匈奴、东胡、鲜卑、室韦)与埃文基人》^[11];(苏)П·И·杜曼《公元三—四世纪胡人在中国境内的分布及其社会结构》^[12]等等。

虽然国外学者的这些专著、学术论文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疑点,有些也带有侵略性的内涵,但却为我们从不同视角研究鲜卑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国内研究状况

(一) 专著

国内较早关注鲜卑历史的应该是晚清那些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

文化领域时代脉搏的学者们。张穆、魏源、何秋涛、曹廷杰、丁谦、屠寄、徐宗亮等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均对鲜卑历史有所涉猎。张穆的代表作《蒙古游牧记》包含有对鲜卑起源地鲜卑山的考证。^[13]徐宗亮等《黑龙江述略》在鲜卑族称、拓跋名号等方面做了考证。^[14]20世纪上半叶,伴随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民族学研究取得进步,诸民族学家系统研究中国各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其中,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东胡系·鲜卑》篇、吕思勉《中国民族史》《鲜卑》篇,对鲜卑的起源、得名缘由、鲜卑各部的发展脉络等内容做了考证。^[15-16]

晚清至20世纪上半叶的鲜卑史研究,因受到当时的史料所限或没有掌握科学的审音与勘同方法,很多观点遭到后人的质疑,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得出的一些可给后人启示的结论,仍值得我们借鉴。

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史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962年出版的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是鲜卑史研究代表性专著。作者开创性的将鲜卑分为东部鲜卑、拓跋鲜卑。针对东部鲜卑(前、后期的东部鲜卑)、拓跋鲜卑(起源和迁徙、拓跋部和以拓跋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之形成、从部落联盟过渡到国家的过程)等内容,马长寿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乌桓与鲜卑》成为鲜卑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显著性标志。^[3]

1980年7月,根据史籍提供的点滴线索,米文平、曹永年等学者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处,当地居民称之为“嘎仙洞”的石洞里,发现了北魏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祝文石刻。经研究证实,“嘎仙洞”就是史籍中记述的拓跋魏先帝“旧墟石室”。该发现作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受到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17],“为拓跋鲜卑的起源地提供了准确的地理坐标”^[18],从而引起鲜卑史研究的新一轮高潮,大量学术专著出版。主要有:米文平《鲜卑史研究》^[19]、田余庆《拓跋史探》^[20]、林幹《东胡史》^[21]、林幹、再思《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22]、刘学钊《鲜卑史论》^[23]、张博泉《鲜卑新论》^[24]、何光岳《东胡源流史》^[25]、陶克涛《毡乡春秋·拓跋篇》^[26]等。虽然有些提法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学者们的研究和考

证使鲜卑族历史更为清晰化。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其著作中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涉及拓跋鲜卑内容: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靺鞨研究》通过分析“拓跋鲜卑的迁徙和室韦的见载于史、室韦与鲜卑的译名根据相同、室韦与早期拓跋鲜卑地域相同、室韦的语言与鲜卑相通、室韦有特征性的风俗与拓跋鲜卑相同、文献记载把室韦看做是鲜卑后裔”等内容,对室韦的来源做了一次精密的考察,经过深入完整系统地论证,得出“室韦与拓跋鲜卑同源”“室韦是拓跋鲜卑后裔或是留居大鲜卑山地区鲜卑一支的后裔”的结论;^[27]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从鲜卑与当时政权、相邻民族的关系等角度,对东部鲜卑、拓跋鲜卑的历史有所涉及;^[28]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概述了早期拓跋鲜卑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社会及物质文化特征,认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同源;^[29]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30]通过对“嘎仙洞与呼伦池时期、拓跋氏族制度机关的改造、新的国家机构的逐渐出现、拓跋早期国家的性质”等内容的论述,得出力微到什翼犍阶段是拓跋早期国家形成期的结论。李德山、栾凡《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中,也有涉及拓跋鲜卑历史的内容。^[31-32]前人的有益探索,无疑为后来者研究提供了许多启示和可资借鉴之处。

(二) 论文

随着拓跋鲜卑“旧墟石室”石刻祝文的发现,大量内容涵盖早期拓跋鲜卑史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主要包括嘎仙洞石室祝文及拓跋鲜卑发祥地研究、拓跋族名、族源及早期迁徙研究、拓跋鲜卑的早期社会研究等三方面内容。

1. 关于嘎仙洞石室祝文及拓跋鲜卑发祥地研究。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通过在1980年7月30日于嘎仙洞石壁上找到的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石刻,确认嘎仙洞即北魏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33]陈连开《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17]、《鲜卑山考》^[34]依据嘎仙洞鲜卑石室,认定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佟柱臣《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认定拓跋鲜

卑先祖所在的大鲜卑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18]王大方《嘎仙洞遗址》^[35]通过祝文,证明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祖先长期居住的地方,等等。还有许多学者发表相关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研究者们都对嘎仙洞石刻祝文发现的意义给予充分肯定。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拓跋鲜卑发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即为鲜卑拓跋部的“祖庙石室”,史籍中记载的“大鲜卑山”是指大兴安岭北段的结论,但陶克涛、张博泉、李志敏等学者则提出异议。关于拓跋鲜卑发祥地问题,学界仍在进一步讨论中。

2. 关于拓跋鲜卑族名来源、族源及早期迁徙的研究。(1) 拓跋鲜卑族名来源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认为“‘拓跋’是作为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一组复合词,很可能本来只是该部落某一首领所担任的职务的名号,后来竟然凝固而成为部族名称并进一步成为该部族统治家族的家族姓氏”^[36]。其他学者的观点还有:“拓跋”是迁徙过程中,鲜卑与匈奴发生婚媾关系,“鲜卑父匈奴母相融合而产生的一个族名”^{[3](247)}、“拓跋一名,乃驻牧于大鲜卑山的鲜卑人自远祖以来的自称”^{[21](80)}。(2) 关于拓跋鲜卑族源,依据历史文献的不同记载,学界存在如下互异之说:拓跋鲜卑为黄帝后裔、为李陵后裔、为东胡之“支”或“余”、源于东夷,等等。另外,学者林沅对学界普遍采用的早期鲜卑分东部鲜卑、拓跋鲜卑的界定提出异议,“把鲜卑分成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其实是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所使用的权宜性分类名词,根本不应作为文化分类概念来理解”^{[37](序5)}。可见,对拓跋鲜卑族名来源、族源的释义众说纷纭,其中不免存在牵强附会的成分,有必要继续探讨。(3) 拓跋鲜卑早期迁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林幹《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路线的初步探索》论证了早期拓跋鲜卑迁徙路线是从北段大兴安岭迁至呼伦湖再迁至河套及大青山一带;^[38]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论述了拓跋鲜卑的南迁及其所建之北魏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地位;^[39]陈可畏《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认为“大泽”在今嫩江下游地区,“匈奴故地”是在今海拉尔河、伊敏河、呼伦湖流域;^[40]曹

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论证拓跋部由呼伦贝尔草原南迁阴山北麓匈奴故地,约在公元163至166年之间,^[41]等等。拓跋鲜卑早期两次大规模迁徙的时间及路线等问题一直为史学界关注,是鲜卑史和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者深感兴趣的课题。学者各抒己见,不同说法存在争议。在拓跋鲜卑早期迁徙历史研究中,对史籍记载“大泽”是否确为今呼伦湖,“匈奴故地”的位置是在漠南河套阴山地区还是在西伯利亚或其他地区;早期拓跋鲜卑迁徙的时间及路线;第二推寅是否为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等问题,学界仍存在不同观点。

3. 关于拓跋鲜卑早期社会的研究。主要有: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认为呼伦贝尔时期拓跋鲜卑血缘氏族制度已经接近尽头^[42];武玉环《拓跋、契丹、女真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论述拓跋邻、力微时期,国家的各种因素开始萌芽;^[43]许辉《鲜卑族拓跋部封建化历程述论》认为什翼犍时期,拓跋部初具国家规模,^[44]等等。早期拓跋鲜卑社会形态是史学界深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存在着不同意见。马长寿主张“拓跋珪即代王位,拓跋魏的政治组织仍带有浓厚的部落联盟性质。从386年开始……部落联盟始告瓦解,而向国家过渡。真正的封建国家至孝文帝拓跋宏时始告完成”^{[3](283)};曹永年认为献帝邻迁徙之前,进行了“七分国人”、“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位授子”等,这些事件标志拓跋鲜卑已经具备了国家的条件,就拓跋族内部的社会发展而言“拓跋邻南迁时……拓跋族已经迈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建立了国家”^[42];黄烈认为“从力微到什翼犍,拓跋结合体已粗具国家规模,尽管还不很完备,但已属于国家范畴,我们可以名之为拓跋早期国家”^{[30](306-307)}。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对拓跋族社会发展程度的看法不同;二是对有关各族在拓跋氏建国中的影响和作用认识不同;三是对拓跋国家形成的标志理解不同”^{[30](273)}。

(三) 考古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我国鲜卑考古学获得巨大成就,成为鲜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强有力支柱。其间,发布了多篇鲜卑墓葬的清

理简报和发掘报告,发表了不少鲜卑考古研究论文和结合考古探讨鲜卑历史的学术论著。

1. 关于被多数学者认定为早期拓跋鲜卑遗存的发掘简报和考古报告。主要有: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45]、《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46],王成《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47],陈凤山、白劲松《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48],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49],李作智《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50],陈凤山等《呼伦贝尔市团结墓地》^[51],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52],王成等《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53],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54],赵玉明《额尔古纳右旗七卡鲜卑墓清理简报》^[55],肖海昕《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鲜卑墓》^[56],云蕻《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发现一座鲜卑墓葬》^[57],刘观民《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58],王刚《林西县苏泗汰鲜卑墓葬》^[59],宁培杰、魏坚《二连浩特市盐池墓葬》^[60],李兴盛、魏坚《商都县东大井墓地》^[61],崔利明《内蒙古兴和县叭沟村鲜卑时期墓葬》^[62],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63],杜承武、李兴盛《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64],金学山《内蒙古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三座鲜卑墓》^[65],米文平《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1980年清理简报》^[66]等等。

这些发掘简报和考古报告,除嘎仙洞遗址是拓跋鲜卑居址遗存外,其余皆为拓跋鲜卑迁徙途中的墓葬遗存。墓葬发掘简报和报告介绍了每一处墓葬的分布、墓室、葬具和葬式、随葬品等情况。虽然有些观点仍需进一步的考古论证,但这些通过实地发掘获得的材料,为我们较全面了解拓跋鲜卑的社会发展、经济进步、民族交往等历史面貌提供了原始直观的依据。

2. 利用考古成果进行早期拓跋鲜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包括: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通过分析呼伦贝尔拓跋鲜卑早期墓葬、赤峰市巴林左旗的遗迹、乌兰察布盟墓群的特点,认为这些是拓跋鲜卑迁徙过程中留下的遗存,拓跋鲜卑大致沿着上述地区的路线进行迁徙。大泽应是呼伦池、匈奴故地

即今内蒙古河套东部一带。得出呼伦贝尔时期,拓跋鲜卑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游牧畜牧经济发展;赤峰南杨家营子时期,父系的权威树立起来;乌兰察布盟地区墓群是拓跋鲜卑进入蒙古草原初期的遗迹,农业因素增长,受汉族影响加深等结论。^[67]长期以来,宿白的这些见解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研究起影响作用。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对呼伦贝尔地区目前被确定为早期拓跋鲜卑的遗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为拓跋鲜卑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依据;^[68]孙危《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分期分区的对鲜卑各部在历经五个多世纪的大迁徙中,在内蒙古地区留下的大量类型各异墓葬的研究^[69];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就早期鲜卑的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做了回顾与概括^[70];干志耿、孙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得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同源的结论,论证了早期鲜卑物质文化特征,^[71]等等。

3. 通过研究墓葬中的人骨,一些学者对拓跋鲜卑人种进行了研究。早期拓跋鲜卑人种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包括:潘其凤、韩康信《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在对扎赉诺尔墓、完工墓、南阳家营子墓的颅骨与时代相近的贝加尔湖西部地区的匈奴墓的颅骨平均数进行比较后,得出了他们“与匈奴组之间的组差一般都比较小,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密切”,该3种颅骨都归属蒙古大人种的结论;^[72]朱泓《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得出扎赉诺尔墓地中出现了种族混杂现象、他们可能是以匈奴遗传因素为主的混血后代,或是“自号鲜卑”的北匈奴人中成员的结论;^[73]朱泓《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族颅骨的人种学研究》认为鲜卑族是一个有着共同的人种学渊源的共同体,拓跋鲜卑与东部鲜卑在种系上是同源的,等等。^[74]这些人种学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就,为早期拓跋鲜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支撑。

4. 有关探讨内蒙古境内鲜卑墓葬的专著主要包括:魏坚主编《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包括十篇考古发掘报告及六篇研究文章,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见解;^[37]孙危《鲜卑考古学文

化研究》结合史料记载和目前的考古学资料,对鲜卑的文化面貌、文化内涵及族属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和界定,同时对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匈奴文化的交流互动影响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75]“是中国学者关于鲜卑考古研究的第一本学术专著”^[76],等等。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研究发展迅速。发掘简报报告、研究论文、研究专著等诸成果为全面深入地综合研究拓跋鲜卑历史提供了帮助。

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由于史料缺乏的局限,研究受到一定限制。挖掘现有文献,利用历史语言学、人种学及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将该学科研究途径的这四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取得新进展。

参考文献:

- [1]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 何天明. 试论鲜卑族的迁徙及其社会进步[J].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4 (3).
- [3] 马长寿. 乌桓与鲜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 [4] 亦邻真. 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A]. 亦邻真. 亦邻真蒙古学文集[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 [5] [法]伯希和. 支那名称之起源[A]. 冯承钧译.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6] [英]巴克尔. 鞑靼千年史[M]. 向达, 黄静渊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7] [日]江上波夫. 内蒙古百灵庙砂凹地の古坟[A]. アシア文化史研究・论考篇[C].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67.
- [8] [日]白鸟库吉. 东胡民族考[M]. 方壮猷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 [9] [日]内田吟风. 乌桓、鲜卑的习俗[J]. 李步嘉摘译. 民族译丛, 1985 (1).
- [10] [日]船木胜马. 关于匈奴、乌桓、鲜卑的“大人”[J]. 古清尧摘译. 民族译丛, 1984 (3).
- [11] [俄]耶·姆·札尔金特. 中国编年史中的古代各族(匈奴、东胡、鲜卑、室韦)与埃文基人[J]. 罗致平译. 民族问题译丛, 1957 (1).
- [12] [苏]П·И·杜曼. 公元三一四世纪胡人在中国境内的分布及其社会结构[A]. 李锡厚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 民族史译文集(10)[C]. 北京, 1981.
- [13] 张穆. 蒙古游牧记[M]. 张正明, 宋举成点校. 太

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14]徐宗亮等. 黑龙江述略[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15]林惠祥. 中国民族史(上、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16]吕思勉. 中国民族史[M]. 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17]陈连开. 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J]. 民族研究, 1982 (6).

[18]佟柱臣. 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J]. 历史研究, 1981 (6).

[19]米文平. 鲜卑史研究[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20]田余庆. 拓跋史探[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21]林幹. 东胡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2]林幹. 再思. 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5.

[23]刘学铤. 鲜卑史论[M]. 台北: 南天书局, 1994.

[24]张博泉. 鲜卑新论[M].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25]何光岳. 东胡源流史[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26]陶克涛. 毡乡春秋·拓跋篇[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27]张久和. 原蒙古人的历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8]翁独健.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9]干志耿. 孙秀仁. 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30]黄烈. 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31]李德山. 栾凡. 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2]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33]米文平. 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J]. 文物, 1981 (2).

[34]陈连开. 鲜卑山考[J]. 社会科学战线, 1982 (3).

[35]王大方. 嘎仙洞遗址[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1 (1).

[36]罗新.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J]. 历史研究, 2006 (6).

[37]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38]林幹. 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路线的初步探索[J]. 北方文物, 1989 (3).

[39]舒顺林. 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J]. 内蒙古师大学报, 1984 (4).

[40]陈可畏. 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J].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89 (4).

[41]曹永年. 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7 (4).

[42]曹永年. 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J]. 历史研究, 1987 (5).

[43]武玉环. 拓跋、契丹、女真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J].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4 (1).

[44]许辉. 鲜卑族拓跋部封建化历程述论[J]. 学海, 1993 (3).

[45]郑隆. 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J]. 考古, 1961 (12).

[46]郑隆. 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J]. 文物, 1961 (9).

[47]王成. 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J]. 北方文物, 1987 (3).

[48]陈凤山. 白劲松. 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4 (2).

[49]潘行荣.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J]. 考古, 1962 (11).

[50]李作智.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J]. 考古, 1965 (6).

[51]陈凤山. 殷焕良. 白劲松. 等. 呼伦贝尔市团结墓地[A].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52]程道宏. 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2 (2).

[53]王成. 塔拉. 张春. 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54]赵越. 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J]. 考古, 1990 (10).

[55]赵玉明. 额尔古纳右旗七卡鲜卑墓清理简报[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56]肖海昕. 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鲜卑墓[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57]云蔽. 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发现一座鲜卑墓葬[J]. 北方文物, 1987 (4).

- [58]刘观民. 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J]. 考古, 1964 (1).
- [59]王刚. 林西县苏泗汰鲜卑墓葬[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 [60]宁培杰 魏坚. 二连浩特市盐池墓葬[A].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61]李兴盛 魏坚. 商都县东大井墓地[A].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62]崔利明. 内蒙古兴和县叭沟村鲜卑时期墓葬[J]. 考古, 1993 (3).
- [63]郑隆 李逸友. 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A].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4.
- [64]杜承武 李兴盛. 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 [65]金学山. 内蒙古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三座鲜卑墓[J]. 考古, 1991 (5).
- [66]米文平. 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 1980 年清理简报[A]. 米文平. 鲜卑史研究[C].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 [67]宿白. 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J]. 文物, 1977 (5).
- [68]乔梁 杨晶. 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3 (2).
- [69]孙危.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1 (1).
- [70]吴松岩. 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J]. 东北史地, 2009 (1).
- [71]干志耿 孙秀仁. 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J]. 民族研究, 1982 (1).
- [72]潘其风 韩康信. 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J]. 考古学报, 1982 (1).
- [73]朱泓. 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J]. 北方文物, 1989 (2).
- [74]朱泓. 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族颅骨的人种学研究[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 [75]孙危. 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76]倪润安. 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10 (1).

【责任编辑 于默颖】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f Early Tuoba-Xianbei

LIANG Yun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uoba-Xianbe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ribes of Xianbei. Establish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uoba-Xianbei played a key role that linked the preceding with the following in Chinese history. During early Tuoba-Xianbei history, Historians conducted in-deep and systematical research on the Sacrifice Article on the wall in Gaxian cave,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Tuoba-Xianbei, the origin of the Tuoba Tribe, its early migration, its early society and so on, and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os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provide a solid support for the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f early Tuoba-Xianbei.

Key words: Xianbei; early Tuoba; research; review